

全球债市暴跌，高负债国家债务压力严峻——

发达经济体为何开启加息潮？

本报记者 高 乔

环 球 热 点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近日报道，全球经济面临一项新挑战：动荡的债券市场正将借贷成本推至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连日来，美国国债收益率震荡上行，日本、英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国债收益率也各自创下新高。面对中东动荡局势和全球油价上涨，发达经济体陆续开始加息，高负债国家面临更加严峻经济考验。



8月26日，顾客在美国纽约一家超市内选购商品。

新华社记者 张凤国摄

多国债券收益率创新高

今年7月以来，美国国债收益率整体震荡上行。美国2年期国债到30年国债的收益率大多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9月10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逼近4.95%，为2025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至5.37%，创下近20年来最高水平。

“其他高负债国家的国债收益率也各自创下新高。”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近日报道称，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自1996年以来首次触及3%。德国和法国的债券收益率也升至十多年来的最高水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金融学院教授范言慧分析，债券价格与到期收益率存在反向变动关系。当市场产生加息预期时，投资者会抛售国债，国债价格随之走低，收益率同步上行。发达经济体债市走低与市场对这些国家央行加息的预期直接相关：当前，市场对美联储、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已非常明确，发达经济体中多国已迈出加息步伐，金融市场对此作出反应，国债价格走低。

据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网站报道，9月2日，新西兰央行宣布加息，这是今年第二次上调借贷成本。日本央行于6月加息，韩国央行在7月和8月连续两次加息。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报道，在债券市场再掀抛售潮之际，欧洲央行近日将利率上调至2.5%。该机构还警告称，由于美伊冲突，能源价格居高不下，欧元区通胀率预计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远高于2%的目标水平。

应对油价高企带来的通胀问题

为什么发达经济体纷纷开始加息？

范言慧分析，外部核心影响因素是美伊冲突导致国际油价高企。日本对石油进口依赖度高，国际油价上涨加剧日本输入性通胀风险，欧洲多国也面临能源价格上涨引发的通胀压力。相关国家央行采取紧缩货币政策，试图通过加息控制通胀。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沙特阿拉伯通报称，其8月份的原油日产量为620万桶，为2026年以来的最低月度数据，较7月份下降了23%。标普全球能源公司表示，随着美伊冲突彻底得到解决的前景变得日益渺茫，石油市场正在进入油价居高不下的“新常态”。该研究机构称，美伊冲突爆发以来，这是其首次预测中东原油产量在2027年底之前无法恢复到战前水平。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网站刊文称，中东战乱导致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在欧洲，天然气价格已经是美伊冲突爆发前的两倍以上。随着欧洲各国为迎接冬季而补充天然气库存，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上涨。政策制定者正在对越来越多显示物价上行压力的迹象作出反应。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年通胀率已停止向2%这一大多数国家设定的通胀目标回落，反而在最近几个月略有回升。8月份，欧元区的年通胀率达到3.3%，为三年来的最高水平。

“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高额债务压力，如美国联邦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日本公共债务占GDP比重也处于高位，高负债叠加高通胀，加剧了市场对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发达经济体债市出现普遍下跌。”范言慧说。

体现市场对债务不可持续担忧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网站刊文分析，能源价格上涨是通胀的主要原因，但并非唯一因素。据估计，在发达经济体，剔除能源和食品价格后的平均年“核心”通胀率已从2026年初的2.7%上升至目前的2.9%。

“在财政高负债背景下，加息意味着政府偿债成本上升。若一国的国债利率水平逐渐逼近甚至高于经济增长率，本身就体现了市场对于该国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范言慧分析，目前，美国1年及以上期限的国债收益率已达4%以上，若持续高于其GDP增速，将引发美债市场甚至国际金融市场波动。但从以往市场规律来看，每当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时，全球资本往往出于避险需求回流美国，购买美国国债这一相对安全的资产，这又会推高美债价格、压低国债收益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国的压力。换言之，由于美元占据全球储备货币地位以及美国经济的重要地位，美债市场波动会通过国际金融市场产生外溢效应。

范言慧分析，未来债券市场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伊冲突的持续性及市场对油价和通胀预期的影响。从当前中东局势来看，美伊冲突短期内平息的可能性较低，如果冲突维持一种“僵持但不升级”的平衡状态，市场对冲突加剧的预期减弱，发达经济体通胀预期和利率上行压力将得到缓和，有利于债市企稳。但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如何应对国际油价“新常态”对供应链的冲击、处理高额债务仍是一场持续考验。

共同建设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

——第十六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形成重要共识成果



第十六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现场。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摄

近日，第十六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在北京召开，APEC成员经济体的部长和代表、各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聚焦“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能源领域主题，围绕APEC“中国年”能源领域三大优先方向开展交流讨论，凝聚合作共识。

首次提出“亚太能源共同体”

会议形成了“1+3+5”成果体系，具体来看，发布1个声明，即《2026年APEC能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通过3项专业领域共识成果，即《APEC高质量能源普惠愿景与行动》《APEC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政策推荐（2026—2030）》《APEC促进能源安全协同的非约束性准则》；作出5项东道主自主贡献承诺。

其中，会议通过的部长联合声明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亚太能源合作实践，首次提出并系统阐释了“亚太能源共同体”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展现了各方协同加强亚太能源安全、保障民生用能服务、推进转型发展的实践经验与治理理念。

当前，国际能源市场震荡加剧，极端气候和自然灾害频发，能源安全问题凸显，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节奏分化，全球能源治理的有效性亟待增强。APEC成员经济体贡献全球六成以上GDP和约六成能源需求，是全球能源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表示，联合声明提出，能源转型节奏不搞“一刀切”，尊重各经济体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差异，既肯定可再生能源发展方向，也承认化石能源在系统稳定中的作用，体现“先立后破、有序转型”的治理理念，确保转型进程中能源安全不受影响、民生用能不受影响。

提升区域能源韧性

当前，亚太地区超过45%的原油、23%的天然气来自中东，受供应中断的影响尤为直接，会议把能源安全协同治理摆在今年APEC能源合作突出位置。

会议通过《APEC促进能源安全协同的非约束性准则》，提出以综合安全的视角审视能源安全，推进能源品种和进口来源多元化，坚持有效市场，开展应急响应合作，以创新合作破解发展中的问题，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灾害应对，为区域应对市场波动、供应链风险、极端天气等多重挑战提供行动指引。

“能源安全没有‘孤岛’，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够在区域性供应冲击中独善其身。我们坚持自愿、非约束原则，尊重各经济体自主确定能源发展道路。”王宏志说，文件为区域应对市场波动、供应链风险、极端天气等多重挑战提供行动指引。

以创新合作破解发展中的问题，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新机遇。会议通过的《APEC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政策推荐（2026—2030）》是APEC首份聚焦“人工智能+能源双向赋能”的共识文件，既明确能源系统对算力基础设施的支撑保障作用，又强调人工智能对提升能源系统效率、增强能源系统韧性的赋能价值。

以普惠促进发展成果共享

近年来，亚太地区能源可及水平显著提升，无电人口大幅降至约1412万，仅为全球无电人口的2.1%，区域能源发展正从“保障基本民生用能”迈向“提质赋能美好生活”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会议通过《APEC高质量能源普惠愿景与行动》，首次明确“安全可靠、充足韧性、普遍可及、可持续、可负担”的高质量能源普惠内涵，指引区域合作重心从基础用能覆盖向服务品质提升转变。

APEC北京能源会议周期间，5项中方自主贡献成果配套推出，通过政策报告、技术方案和能力培训等方式，面向所有经济体开放共享。

其中，南方电网公司提供支持的《构建适应高比例新能源的新型电力系统推荐解决方案》充分吸纳中国高比例新能源接入电力系统成熟实践经验，兼顾不同经济体发展阶段与资源禀赋差异，从技术、政策、协作三个维度构建系统性推荐框架，围绕新能源发展趋势、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路径、区域能源协同发展等核心议题，形成可参考、可组合、可扩展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思路。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汪剑波表示，5项自主贡献来自中国能源发展的真实案例与技术经验，是经过实践检验、可供各经济体结合自身实际参考借鉴的务实方案。“中方愿同各经济体一道，把共识转化为行动，把经验转化为合作，共同建设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汪剑波说。

（据新华社电 记者王悦阳）



邵葆丽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
均为本报记者
林子涵摄

邵葆丽
办公室挂着的
泰戈尔画像。

在新德里，寻找『竺震旦』

本报记者
林子涵 李婕

1924年，一位白发银须的诗人渡海来到中国。在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等城市，他与中国知识界人士见面、交流。在一场为他举行的祝寿会上，梁启超送给他一个特别的中文名字——“竺震旦”。

“竺”，取自中国古代对印度的称呼“天竺”。“震旦”，则与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有关。

这位老人就是泰戈尔。在他一生的游历和写作中，不同文明如何跨越隔阂、彼此理解，一直是一个重要命题。他曾在诗中写道，世界不应“被狭小的家国的墙隔成片段”。一个多世纪以后，金砖新德里峰会再次汇聚起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人们。峰会期间，本报记者走进泰戈尔的家乡，探寻这位文化交流使者留下的身影。

走近泰戈尔的世界

9月的新德里，暑热未消。在鸟鸣虫吟中，我们走进尼赫鲁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拜访一位学者。

邵葆丽（Sabaree Mitra），是尼赫鲁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2024年，泰戈尔访华一百周年之际，她作为学术召集人，组织纪念学术研讨会，邀请印度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学者参加，共同回望泰戈尔百年前的中国之行。

走进邵葆丽的办公室，一面墙上挂着徐悲鸿画给泰戈尔的画像，另一侧的墙上，还挂有徐悲鸿奔马图的剪纸。

作为资深的中国语言与文学研究者，邵葆丽的中文地道且流利。她告诉记者，自己与中国语言与文学结缘已有42年。

1982年，20岁的邵葆丽从德里大学生物学专业毕业后，转而学习中文。在尼赫鲁大学中文系读了为期5年的本硕连续学位，又读了一年的副博士学位。1988年至1990年，她来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中国近现代历史和现当代中国文学，此后回到尼赫鲁大学任教，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文化研究。她还通过翻译，把中国文学介绍给更多印度读者。

邵葆丽的母语是孟加拉语，这也是泰戈尔最主要的创作语言。从8岁左右开始，她就接触泰戈尔的戏剧、文学作品。“家里人希望我不仅会唱他的歌，也能理解他的文学、文化和世界观。”她说。

学习中文后，她开始更加关注泰戈尔与中国的关系。她的老师谭中教授，是著名学者谭云山之子。上世纪20年代，谭云山与泰戈尔相识，并在泰戈尔邀请下赴印度从事中国文化研究和教育工作。

在邵葆丽看来，泰戈尔访问中国，有特定的时代背景。

1913年，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此后，这位来自亚洲的诗人受到中国知识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彼时，中国知识分子正在了解西方，也在重新思考自身文明的价值。泰戈尔来自东方，又长期与西方知识界交往，他的思想因此受到不少中国学者关注。

1924年，泰戈尔应邀访问中国，先后到访多个城市，与梁启超、徐志摩、胡适等中国知识界、文化界人士交流。5月，在北京举行的祝寿活动上，梁启超赠给他“竺震旦”这一中文名字，成为此次访华之行的一段佳话。

不同文明应展开对话

泰戈尔来到中国，并不只是一次文学家的访问。访问期间，他围绕东西方文明、亚洲文化和人类共同未来等问题阐述自己的思考。

泰戈尔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谈到，今天，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把其他国家排除在外的情况下独自进步，应当以善意、理解和相互尊重的精神去面对其他文明。

采访中，邵葆丽拿出诗集，为我们朗诵了泰戈尔《吉檀迦利》第35首中的诗句：“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国的墙隔成片段。”

“泰戈尔的诗展示了他的世界观。”邵葆丽说，“他把全世界各个文化、文明看作一个团体。不同文明之间有差异，也各有自身特点。交流并不是消除差异，而是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了解彼此。”

2024年，泰戈尔访华100周年。邵葆丽把纪念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定为“一次难忘的相遇：当代世界文明对话的意义”。

“不管文化多么不同，总有可以对话的地方，也总有可以相互学习的东西。”她说，“他知道，西方没有人类发展的所有答案。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吸收有价值的东西，思考人类未来应该走什么样的路。”

让更多人了解彼此

来到新德里，正值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举行。

谈到金砖国家之间的交流与交往时，邵葆丽期待，国与国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用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

“除了政府间的交往，民众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学者、青年、游客的交流，同样影响着我们如何相互认识。”她表示，期待金砖加强青年交流，让不同行业的普通民众更多参与其中。金砖国家也可以通过纪录片等方式，介绍各国的文学、节日、文化和社会生活。

百余年后的今天，为什么人们依然讨论“竺震旦”的中国之行？在尼赫鲁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几名年轻的印度学子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博士生肖瑞婷从小便熟悉泰戈尔。在她看来，泰戈尔把世界看作一个大家庭，不同国家和文明即使存在差异，也能够找到彼此之间的联结。“他期待世界上有更多合作，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博士生苏迪本科和硕士均就读于泰戈尔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现在在尼赫鲁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读博士。“学习中文后，我进一步了解到泰戈尔访华的历史，发现泰戈尔的世界观与中国哲学有美妙的呼应。”

从泰戈尔当年的中国之行，到今天不断拓展的“大金砖合作”，坚持开放包容、倡导交流互鉴，也是中国不变的答案。

百余年前，梁启超将“竺”与“震旦”放进同一个名字，赠与远道而来的泰戈尔。百余年后，在新德里，“竺震旦”的故事还在被讲述。不同文明如何跨越隔阂、增进理解，这个问题仍在等待一代代人作答。